

治道与志道：清代甘肃道志编纂研究

陈郑云

提 要：道志作为以道为行政单位编纂的特殊方志类型，是地方道制变迁的产物。道在名称上不能保持独立性和稳定性，故道志有“直接以道命名”和“不以道命名”的两种情况。由于道的辖区与道员职掌的特殊性，清代甘肃出现乾隆《重修肃州新志》与乾隆《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两种不直接以道命名的志书。从表面上看，道志的编纂首先以其所属的州县卫所为纲，然后分门别类地叙述该区域的历史和现状，各纲（州县卫所）之间互不统属，看似与道无关。其实，从书写实际来看，因道不是独立的行政区划，故编纂者在书写中巧妙地将道的建置与道员任职等史事包含在其驻地（州县）的叙事之中，可称作“以地存道”的书写方式，既由道制的特殊性决定的，也是编纂者“折中”的“志识”体现。

关键词：道制 地方治理 道志 方志编修

地方志作为“以行政单位为范围进行分门别类的综合记录”^①，地方行政管理的需要是地方志产生的根本动因，地方政府与地方官均将编纂地方志作为重要“官责”与“业绩”^②，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优秀文化传统。

道志作为以道为行政单位对象编纂的特殊志书类型，由于道作为一级地方行政区划的地位一直未被官方认可的缘故，与常见的省（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相比而言，学界较少涉及，除在地方志辞书与通论性著作中简要提及概念外，目前仅有周勇进所撰《试谈清代的道志》一文介绍道志情况。^③因此，笔者拟在充分检讨前行研究成果的过程中，运用文本分析法，以道制变迁与道志书写为中心，将道志编纂的综合情形与文本细节相结合，探讨道志的界定标准、编纂特色、书写视角等，以期从枯燥无味的行政体制中，透视活跃于体制底层的道员群体的修志活动与治道思考，进而展现道志文本结构的特殊性。

一 道志界说

道具有因事而设、因时而变的特点，故其在命名、辖区、驻所等方面与府、厅、州、县等地方行政体系有着较大差异，道员多驻扎在省城以外，表面上似乎是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但始终是省行政机构官员群体中的一部分，是省行政机构内部管理层级中的最低一级，从清代法典的规定来看，守巡道没有形成独立的行政机构和行政层级，只是省行政机构的派出机构，其辖区属于监察区。^④故《清史稿·职官志》中虽列有道员，而《地理志》中却无道这一级区划，终清一代道未被视作正式政区。^⑤

道志作为以道为对象编纂的特殊志书类型，其命名方式、编纂群体、体例结构、编纂缘起等

① 朱士嘉：《中国地方志浅说》，《文献》1979年第1期。

② 苏长春：《地方志与地方行政管理关系探微》，《中国地方志》1994年第2期；林天蔚：《地方文献研究与分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41页。

③ 参见周勇进：《试谈清代的道志》，《中国地方志》2011年第7期。

④ 参见傅林祥：《清康熙六年后守巡道性质探析》，《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

⑤ 参见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9页。

情况亦非常复杂。目前学界定义“道志”的文献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地方志辞书，如《中国地方志词典》《中国方志大辞典》^①；二是方志学论著，如黄苇等著《方志学》、陈光贻《中国方志学史》^②；通过以上两大类著作对道志的界定可知，道志是地方道制变迁的产物，能称为道志者必备三大要素：即由分巡道、分守道、兵备道等道员主持修纂，以道为行政单位或记述对象（范围），具有方志体例的固有特点。然而，清代守巡道的设置、废除、合并、改置等变化频繁，被废除的守巡道数量极多。^③道的命名多依据驻所或辖区、方位等因素，驻所的变迁、辖区范围的调整会影响道名，说明道在名称上不能保持独立性和稳定性。^④因此，从志书名称、修纂主体、叙述范围、体例结构等方面界说现存志书，道志在命名方式上具有灵活性，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直接以道命名并符合上述要素的志书，亦即周勇进所论：“查《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该书所载以道志为名的方志共有四种，依次为《归绥道志》《朔方道志》《新疆四道志》《湖北下荆南道志》”；^⑤二是不以道命名亦具有上述要素的志书，如明代江西布政使分守饶南九江道王世懋修纂道志名为《三郡图说》，《四库全书总目》称：“是编乃其官分守九江道时所作。三郡者，一饶州、二南康、三九江，皆所隶也。”^⑥三郡指饶南九江道领饶州府、南康府、九江府三府。笔者这里重点讨论甘肃地区乾隆《重修肃州新志》、乾隆《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

在清代甘肃内地化的进程中，道制调整变化纷繁，但总体上道在边疆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实现了中央对边疆的分区域管理与控制。在道制运作下出现的乾隆《重修肃州新志》、乾隆《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以往目录学论著多将其定为“府州志”。^⑦结合上述道志的基本要素，笔者认为这两种志书是不以道命名的道志。其理由如下：

首先，从修纂主体上看，乾隆《重修肃州新志》的主持修纂者黄文炜的行政职务为“分巡肃州道，抚治番夷，兼管水利、屯田、马政，署安西兵备道印务”、沈青崖的行政职务为“陕西布政使司督理粮储道”，乾隆《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的主持修纂者张之浚的行政职务为“分守凉庄道”、张昭美的行政职务为“广东雷琼道”，可见两种志书的修纂领导主体均为道员。

其次，从记述范围（对象）上看，修纂于乾隆二年（1737）的《重修肃州新志》，其记述范围及一级纲目是肃州、高台县、安西卫、沙州卫、柳沟卫、靖逆卫、赤金所，而是时分巡肃州道领肃州直隶州、高台县，安西兵备道领安西、靖逆二直隶厅及安西卫、柳沟卫、沙州卫、靖逆卫、赤金所四卫一所，可见该志为分巡肃州道及安西兵备道合志，此亦道员黄文炜监察区范围；修纂于乾隆十四年的《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其记述范围及一级纲目为武威县、镇番县、永昌县、古浪县、平番县，而是时分守凉庄道领凉州府及附廓武威县、镇番县、永昌县、古浪县、平番县五县，可见该志为分守凉庄道志。

① 详见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词典》，黄山书社，1986年，第489页；本书编委会：《中国方志大辞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页。

② 详见黄苇等：《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7页；陈光贻：《中国方志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页。

③ 参见傅林祥、林涓、任玉雪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清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页。

④ 参见卢祥亮：《清代北方六省道志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54页。

⑤ 周勇进：《试谈清代的道志》，《中国地方志》2011年第7期。

⑥ 永瑤等：《四库全书总目》卷74《史部·地理类》，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644页。

⑦ 如张维：《陇右方志录》，大北印书局，1934年，第28页；金恩辉、胡述兆主编：《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第26—39页；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编：《甘肃省藏古代地方志总目提要》，甘肃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28页，等等。

再次，从编纂体例上看，乾隆《重修肃州新志》、乾隆《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均为纲目体志书，符合方志体例的特点，具体详后论述。

综合以上特色，现存甘肃的乾隆《重修肃州新志》若为州志，则当以是时肃州行政区划命名为“肃州直隶州志”或“直隶肃州志”，通过上记述范围简析可知并非“直隶州志”；乾隆《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若为府志则当以是时凉州行政区划命名为“凉州府志”，通过上记述范围简析可知并非“府志”。是故，乾隆《重修肃州新志》、乾隆《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均为“不以道命名的道志”。

二 从“治道”到“志道”：清代甘肃道志的修纂缘起

有清一代，在三修《大清一统志》的推动下，中央政府数十次颁布修志诏令和志书编修凡例，以倡导和规范各地方志编修事业，新修方志成为地方各级官府的政治任务，全面促进了地方志的普遍修纂，形成了“上自国都，下及省、府、州、县，莫不有志”的修志局面。一统志、省志以及府厅州县诸志共同组成了一个层次分明的志书体系，诚如两江总督于成龙所言：“夫修志之役必始于县，县志成乃上之府，府荟集之为府志，府志成上之督抚，督抚荟集之为通志，通志归之礼部，然后辑为一统志。”^①那么，道——作为介于省、府（直隶州、厅）之间的一个行政层级，地方行政区划的地位未被官方认可，亦不在中央政府诏令规定的修志政区序列。考之历史文献，诞生于甘肃河西走廊地区的两种道志修纂缘起，除受中央政府诏令及《大清一统志》编修的影响以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因素：

（一）清王朝经营西北边疆战略的影响

清代的边疆经略对于现代中国版图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明代在西北地区取守势，河西走廊北、西、南三面都为所谓“番虏”包围，“自明初弃敦煌，画酒泉之半，塞垣内外，椎髻拂庐、白题珠汗，与蔓草黄沙相望，风声气习，咸以耕战为务，其于稽古礼文之事，诚未遑焉”，因此，在士人心目中向有“地狭民贫”“孤悬绝域”之感，军事气息浓厚。康熙时期清政府致力于恢复对西域的经营，突破明代以嘉峪关作为西北极边的格局，在平定准噶尔部后，在河西走廊留驻大军，同时增设卫所、开设屯田，“绳绳继继，休养生息，以迄于兹；户口日繁，田畴日辟，庠序之士，挟册吟诵，濯磨奋厉，彬彬可观”^②，较前代呈现出人丁兴旺、粮产丰裕、交通发达的繁荣格局。雍正时期，清廷与准部战事不断，河西走廊特别是肃州成为收复、控制西域的重要战略基地与军事支点。^③在“煌煌乎规模宏远，西被流沙，声教暨迄，媲美唐虞，远逾三代”的大背景下，川陕总督查郎阿、甘肃巡抚刘於义在肃州指挥协调军政事务的同时，叮嘱分巡肃州道兼安西兵备道黄文炜、督理粮储道沈青崖，在“政事之暇，商榷古今，眷眷以志乘为属”，作为道员黄文炜深切认识到“凡吏于兹土者，稽古礼文，修举废坠，正其时也”^④，修纂道志势在必行。可见，清王朝经营西北边疆的战略对道志修纂产生了直接影响。

（二）“官斯土者于有责焉”：道员的自觉行为

清代随着道员的管理与职掌，既有固定的钱粮、刑名等基本事务，也有提调乡试、修纂方志

① 于成龙：《江南通志·序》，“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江南，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1册，第1页。

② 黄文炜：乾隆《重修肃州新志·序》，“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48册，第119页。

③ 参见张景平、张克非：《试论清代河西走廊地方志中的国家战略与地方博弈》，《中国地方志》2016年第12期。

④ 黄文炜：乾隆《重修肃州新志·序》，“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第48册，第119—120页。

等文教事务，还有督促某些区域性、临时性的特殊职掌。^①因此，分巡肃州道兼安西兵备道黄文炜表示：“予不敏，承乏肃州分巡，兼摄安西兵备篆”，“因勉力恪承，先翻‘肃镇旧志’，见其板刻漶漫，笔画舛讹，至不可句。而百二十年之事，又绝无官绅士民家藏录本可以征信，文献不足，曷乎难之”，不由发出“官斯土者与有责焉”的感慨。可以看出，道员黄文炜在翻阅旧志后萌生修辑的意识。值得庆幸的是，曾参与修纂雍正《陕西通志》而又“博雅多闻，闳通广见”的沈青崖正好因“军需管枢”的缘故“在肃同事”，在其“极力欣助，逖稽远采”的情况下，“铅槧数月，粗尔成编”。在具体修纂过程中秉持严谨的态度，“其有项款无从考据者，姑且阙如，不敢凿空杜撰，以误后人也；稿既成，一覆阅之，深惭未备，不欲付梓；然窃念万历丙辰至今已百二十年，若更久之，事迹尤易湮晦，后人益难考据”。志稿完成后，黄文炜又“不得已，捐俸数百金，而授之梓，以略存梗概，犹辞命之草创尧画家之粉本，留待后贤之润色，不亦可乎”，此显系自谦之词，正是有道员黄文炜以修志为己任的“勉力恪承”，才“草创粉本”的道志。^②

又如，时任分守凉庄道张之浚在任上“其最著者，设立书院之外，尤急急于此邦文献，不令抱残守缺”^③，于是“檄五属、延名宿纂修”《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编辑过程中张之浚认为“夫志书者，一方之文献也。前之所历，后之所鉴，即或人情运会，地与时易，而转移不甚相运，考诸已往，以酌今兹，如子孙之则效乎高曾祖父，无虑迂回，歧黄之验药于既试，无虑误投，切莫切于此矣”；明确表示，作为分守武威、镇番、永昌、古浪、平番等“五凉”之地的道员最为担心的就是“五凉旧志缺略，谋所以辑之，未得其要”；恰恰就在此时“永昌司锋上官钝斋，示以对山《武功志》，因以为式”^④，于是以明代康海的《武功县志》为范式修辑志书。

由此看出，黄文炜、张之浚两位道员分别主修的《重修肃州新志》《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是在中央政府诏令及《大清一统志》编修规划之外的自觉行为。

（三）“以道事君”，“治道在志”：道员对治道的思考

道的种类较多，道员与一般地方府州县官不同，其职掌因时因地或有不同。《历代职官表》称：诸道“皆掌佐藩臬、核官吏、课农桑、兴贤能、砺风俗、简军实、固封守，以倡所属，而廉察其政治”。^⑤这是中央政府对道员职掌的总体概述，然而道员到任地方后，究竟该如何分巡、分守以治道，则是每个道员需要因地因时来思考。如分守凉庄道张之浚自到任凉州以后“求治以澄源端本为先，察吏以及时勤政为务要”。所以，张之浚在修纂道志时融入自己的“治道”思考，全书分纲列目时以《周礼·地官·大司徒》中“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的“六德”而分六卷（《周礼·地官·大司徒》），依次为智集武威、仁集镇番、圣集永昌、义集古浪、忠集平番、和集为张之浚所撰“学道编”，（刊行时无和集“学道编”，实为五卷）。各卷依明康海所纂《武功县志》列为七卷，依次为地理志、建置志、风俗志、官师志、兵防志、人物志、文艺志等七大类目，各类目围绕“养民”“教民”“齐民”“卫民”“重民”“鼓舞斯民”“嫔民”七大主题而展开叙述，显而易见，张之

① 参见周勇进：《清代地方道制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276页。

② 黄文炜：乾隆《重修肃州新志·序》，“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第48册，第120页。

③ 张昭美：乾隆《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序》，“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560号，第556页。

④ 张之浚：乾隆《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序》，“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560号，第3页。

⑤ 纪昀等：《历代职官表》卷52《司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996页。

浚的“志道”乃是探考“治道”，即实现“立治者于此，展卷了然，即其类以求之，自必有得乎最当者，以是为敬事，而非泛涉者比也，以是为以道事君，而非文献无征者比也”的综治目的。^①

与此同时，在志书名称上，修纂者亦有凸显“治道”之意，诚如甘肃按察使司顾济美所论曰：“五凉考治集，志五凉也。不直曰志而曰考治，何也？志仿于《禹贡》，详于《周礼·职方氏》，皆圣人致治之书也。后人因之，体固不一……五凉之志为考治也，故不直曰志，而曰考治集也。治道果在志乎？曰：昔子朱子知南康军，首按图经察民疾苦，风俗登耗，士习衰弊之由，古之人有行之者，志固足以考治也。”^②在这里，顾济美认为《禹贡》《周礼·职方氏》《三秦记》《华阳国志》等皆为“致治之书”，新纂修“五凉之志”旨在“考治”，因而“不直曰志，而曰考治集”，皆因“治道在志”。

三 合中有分与分中有合：清代甘肃道志的编纂特色

道志作为地方道制下产生的介于省、府（直隶州、厅）之间的一个行政层级的特殊志书类型，那么它在编纂上有何特殊之处、如何书写道的史事，则必然是绕不开的话题。为便于讨论，兹将现存清代甘肃道志的体例结构举要列表如下：

清代甘肃道志结构类目举要表

志名	修纂时间	修纂者及职务	纲（类）目	
重修肃州新志	乾隆二年	黄文炜——分巡肃州道抚治番夷兼管水利屯田马政，署安西兵备道印务 沈青崖——陕西布政使司督理粮储道	河西总叙	
			肃州	天文分野、建置沿革、疆域、形胜、城池—所属城堡、山川、古迹、景致、户口、田赋、杂税、水利、屯田、驿传、桥梁、公署、坊隅、仓库、学校、义学、祠庙、坛壝—所属城堡公署祠宇类、风俗、时令、物产、蠲恤、祥异、职官、名宦、军政、马政、兵饷、戎器、边墙、关隘、烽堠、人物、忠节、孝义、选举、列女、流寓、仙释、文诗、属夷
			高台县	建置沿革、疆域、形胜、城池—所属城堡、山川、古迹、水利、户口、田赋、屯田、公署、学校祠庙、坛壝—所属城堡公署祠宇仓场类、驿传、桥梁、风俗、物产、职官、名宦、营制、边墙、关隘、汛地、烽堠、水头、选举、人物、孝义、节妇、文诗、属夷
			安西卫	建置沿革、疆域、形胜、城池—所属城堡、山川、古迹、户口田赋、物产、公署仓库类、祠庙坛壝类、文武职官、营制、瓜州事宜、防汛、驿塘、文诗

① 张之浚：乾隆《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序》，“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560号，第3—4页。

② 顾济美：乾隆《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序》，“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560号，第441页。

(续表)

志名	修纂时间	修纂者及职务	纲(类)目		
重修肃州新志	乾隆二年	黄文炜——分巡肃州道抚治番夷兼管水利屯田马政,署安西兵备道印务 沈青崖——陕西布政使司督理粮储道	沙州卫	建置沿革、疆域、形胜、城池一所属城堡、山川、古迹、景致、户口田赋、物产、公署仓库类、祠庙坛壝、职官、监督办理官员、营制、防汛、驿塘、名宦、人物、仙释、文诗	
			柳沟卫	建置沿革、疆域、形胜、城池一所属城堡、山川、古迹、景致、户口田赋、物产、公署祠宇仓场类、文武职官、营制、营场牧马、防汛、烽墩、驿传、诗	
			靖逆卫	建置沿革、疆域、形胜、城池一所属城堡、山川水利古迹、公署祠宇坛壝、职官、营制、屯田、驿塘烽墩桥梁、诗文	
			赤金所	建置沿革、疆域、形胜、城池一所属城堡、山川、古迹、水利、户口、田赋、公署学校祠庙仓库类、文武职官、营制、驿递、关隘、防汛烽墩、诗	
			西陲纪略	关外路程、西域路程、哈密、巴里坤、吐鲁番·火州·鲁城、西州回鹘、准噶尔、西域诸部、拾遗补录	
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	乾隆十四年	鉴定——张之浚——分守凉庄道 总修——张昭美——广东雷琼道	凉州疆域总图、凉州疆域总图说		
			智集·武威县志	地理志	星野、沿革、疆域图并说、里至、山川、村社、户口、保甲、田亩、赋则、物产、水利图并说、井泉(桥梁附)、古迹(名贤墓附)、祥异
				建置志	城郭、公署、坛壝、学校(祭田、泮池水、学校铺设附)、驿传(铺舍附)、寺观(祠祀、乡贤名宦附)
				风俗志	士农工商执业、冠婚丧祭宾师岁时伏腊礼仪、番夷(回类附)、仙释附
				官师志	秩官、名宦
				兵防志	营堡、关隘、烽墩、军制(马匹戎器附)、粮餉
				人物志	乡贤、忠孝、节义(附忠孝义妇)、选举、流寓附
文艺志	议疏、碑记、诗歌、技能附				

(续表)

志名	修纂时间	修纂者及职务	纲(类)目		
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	乾隆十四年	鉴定——张之浚——分守凉庄道 总修——张昭美——广东雷琼道	仁集·镇番县志	地理志	星野、沿革、疆域图并说、里至、山川、村社、户口、保甲、田亩(柳林湖附)、赋则(柳林湖附)、物产、水利图并说、井泉、古迹、祥异
				建置志	城郭、公署、坛壝、学校、坊表、驿传、寺观
				风俗志	士农工商执业、冠婚丧祭宾师岁时伏腊礼仪、番夷(回类附)、仙释附
				官师志	秩官、名宦
				兵防志	营堡、关隘、烽墩、军制(马匹戎器附)、粮饷
				人物志	乡贤、忠孝、节义、选举、隐逸(耆旧附)、流寓附
				文艺志	议疏、碑记、诗歌、蒙汉界址记
			圣集·永昌县志	地理志	星野、沿革、疆域图并说、里至、山川、村社(社仓附)、户口(保甲附)、田亩、赋则(薪俸附)、物产、水利图并说、井泉、古迹、祥异、县属北境汉蒙疆界图说
				建置志	城郭、公署、坛壝、学校、坊表、驿传、寺观附
				风俗志	士习、农工商执业、冠婚丧祭宾师岁时伏腊礼仪、番夷(回类附)、仙释附
				官师志	秩官、名宦
				兵防志	营堡、关隘、烽墩、军制(马匹戎器附)、粮饷、(庄浪)土司附
				人物志	乡贤、忠孝、节义、选举、流寓
				文艺志	议疏、碑记、诗歌
			义集·古浪县志	地理志	星野、沿革、疆域图并说、里至、山川、村社(社仓附)、户口、保甲、田亩、赋则(薪俸等附)、物产、水利图并说、井泉(桥梁附)、古迹(附丘墓)、祥异
				建置志	城郭、公署、坛壝、学校、驿传、寺观
				风俗志	士农工商执业、冠婚丧祭宾师岁时伏腊礼仪、番夷(回类附)、仙释附
				官师志	秩官、名宦
				兵防志	营堡、关隘、烽墩、军制(马匹戎器附)、粮饷
				人物志	乡贤、忠孝、节义(附忠孝义妇)、选举、流寓附
				文艺志	议疏、碑记、诗歌

(续表)

志名	修纂时间	修纂者及职务	纲(类)目		
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	乾隆十四年	鉴定——张之浚——分守凉庄道 总修——张昭美——广东雷琼道	忠集·平番县志	地理志	星野、沿革、疆域图并说、里至、山川、村社(社仓附)、户口、保甲、田亩、赋则、物产、水利图并说、井泉、古迹、祥异
				建置志	城郭(牌坊附)、公署、坛壝、学校、驿传、寺观(番寺附)
				风俗志	士农工商执业、冠婚丧祭宾师岁时伏腊礼仪、番夷(回类附)、仙释附
				官师志	秩官、名宦
				兵防志	营堡、关隘、烽墩、军制(马匹戎器附)、粮饷、(庄浪)土司附
				人物志	乡贤、忠孝、节义、选举、耆寿、流寓
				文艺志	议疏、碑记、诗歌
凉州赋、五凉沿革考					

说明：据乾隆《重修肃州新志》、乾隆《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目录”制作

通过以上表格所列乾隆《重修肃州新志》、乾隆《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体例结构类目，从宏观上可窥知，从志书名称上看，两部志书均不以道命名，直曰“××道志”；从修纂主体上看，两部志书均由道员领衔编辑；从志书体例上看，两部志书均是纲目体志书，即以该道所辖州、县、卫、所为纲，以事类为目；从志书结构上看，两部志书都有由“总”到“分”的结构特色；从成书时间上看，两部志书均修纂于“乾隆前期”。现就其具体编纂特色比较分析如下：

(一)“两道合志”与“一道一志”：道志的两种编纂模式

1. “两道合志”的乾隆《重修肃州新志》模式

修纂于乾隆二年(1737)的《重修肃州新志》是将“分巡肃州道”“安西兵备道”两道史事合载一书的道志。这种编纂模式是由道的特点与道员职掌决定的。雍正中后期开始有给地方守巡道加兵备衔之例^①，雍正十二年(1734)，黄文炜始任“整饬分巡肃州道，抚治番夷，兼管水利、屯田、马政，署安西兵备道印务”，从这个职务来看，道员黄文炜职掌事务较为繁重，但其监察区域是分巡肃州道、安西兵备道。

首先，看肃州道、安西道的建置沿革情况。顺治二年(1645)五月，仍明制设整饬肃州道，抚治番、彝，兼管肃州镇屯田事务，驻肃州卫；十六年裁，后复设肃州道。康熙五十七年(1718)二月，于靖逆卫、赤金卫地置同知、通判两厅，隶肃州道辖。雍正二年(1724)三月，靖逆卫同知厅移驻布隆吉尔，改为安西厅；二年十月，裁肃州卫设肃州通判厅，管肃州卫事务；七年四月，为直隶州，仍属肃州道；十一年正月，于安西卫置安西道，领安西、靖逆二直隶厅，

^① 参见周勇进：《清代地方道制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28—129页。

及安西卫、柳沟卫、沙州卫、靖逆卫、赤金所四卫一所。^①那么，至雍正十二年，黄文炜任职时分巡肃州道领肃州直隶州、高台县，安西兵备道领安西、靖逆二直隶厅及安西卫、柳沟卫、沙州卫、靖逆卫、赤金所四卫一所。

其次，看乾隆《重修肃州新志》的记事范围。全书如上表格，一是首列“河西总叙”。从“唐虞疆域”一直写到“本朝建置”，并将不在肃州道、安西道监察区域的甘州、凉州纳入其中。这种书写方式看似“越境”，实则是道员从其军事职权与地方治安出发，基于当时边疆形势在志书编纂中所作的思考。因为，清廷经略西域，道员需供给督运军粮，以安西、肃州为前沿枢纽，而以甘、凉为其直接支撑，且“四郡相连，不可止以一郡论”^②，若不先总叙河西走廊历史沿革，则其后各卷目下记事必然有不明之处，如分别交代又牵涉复杂。二是分别以肃州直隶州、高台县、安西卫、沙州卫、柳沟卫、靖逆卫、赤金所等七个州县卫所为纲分卷叙事。这七个州县卫所恰好是分巡肃州道、安西兵备道的监察区域，在具体叙述中将肃州道史事载入其驻地肃州直隶州部分、将安西道史事载入其驻地安西卫部分。三是后设“西陲外纪”。主要载“边外”诸“番夷”史事，主要描述清代西域的道路、山川古迹、风俗物产以及准部情形等内容，记述空间延伸到中亚一带。这种描述“番夷”的方式，亦是道员在清代开拓边疆的战略背景下，从其肩负“抚治番夷”职责出发的文本投射。从全书整体结构看，形成“总——分”的叙述模式。

2. “一道一志”的乾隆《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模式

修纂于乾隆十四年（1749）的《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是叙述“分守凉庄道”一道史事的志书。这种编纂模式是由道的特点与道员职掌决定的。乾隆十年，张之浚始任“分守凉庄道整饬凉、永、镇羌等处事务”，主要掌理该道属区域钱谷、刑名、督课农桑、考核官吏、简军实、固封守。

首先，看分守凉庄道的建置沿革情况。康熙二年（1662），裁整饬庄浪道入分守西宁道，改设分守凉庄道，辖凉州卫、庄浪卫、永昌卫、镇番卫、固原卫、古浪所等处，驻凉州卫。雍正二年（1724）十月，改凉州厅为凉州府、改凉州卫为武威县、镇番卫改为镇番县、永昌卫改为永昌县、古浪所改为古浪县、庄浪所改为平番县，保留庄浪经营茶务的庄浪厅同知，俱隶凉州府辖，仍属凉庄道。那么，至乾隆十年（1745），张之浚任职时分守凉庄道领凉州府及附廓武威县、镇番县、永昌县、古浪县、平番县五县及庄浪一厅（庄浪厅同知与平番县同城驻）。^③

其次，看乾隆《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的记事范围。全书如上表格，一是首列“凉州疆域总图”与“凉州疆域总图说”。志书修纂者认为：“凉州为河西中枢”，“通盘计之，平番首也，古浪喉也，武威腹也，永昌足也，镇番尾也”，并指出“平番迤南诸山，番土族居。庄浪土司，驻牧连城，土民蕃衍，分布大通河内外，捍西海而卫庄浪。其他番族，散处于镇羌、平城、鱼沟左右两山之间”^④。此种书写方式看似描述疆域形势，实则契合“分守凉庄道整饬凉、永、镇羌等处事务”的监察区域范围。二是分别以武威、镇番、永昌、古浪、平番等五县为纲。此五县正好是分守凉庄道的监察区域，在具体叙述中将凉庄道史事载入其驻地武威县部分。三是后设

① 参见牛平汉主编：《清代政区沿革综表》，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第461页；傅林祥、林涓、任玉雪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清代卷）》，第381页。

② 乾隆《重修肃州新志·凡例》，“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第48册，第120页。

③ 参见牛平汉主编：《清代政区沿革综表》，第461页；傅林祥、林涓、任玉雪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清代卷）》，第378页。

④ 乾隆《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凉州疆域总图说”，“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560号，第8—9页。

“凉州赋”与“五凉沿革考”。修纂者在按语中言道此“殿于全志之后，以为总域遥应”^①，简叙前凉、后凉、北凉、南凉、西凉等“五凉”史迹，旨在与志书“五凉”（即武威、镇番、永昌、古浪、平番）的“总域”遥相呼应。从全书整体结构看，呈现“总——分——总”的叙述模式。

以上通过从道的辖区与道员职掌两个视角分析，乾隆《重修肃州新志》与乾隆《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两种道志分别形成了“两道合志”与“一道一志”两种不同的道志编纂模式，这种模式是由道的辖区与道员职掌所导致的。

（二）“以地存道”：道志对道的书写方式

道志作为以道为行政单位修纂的特殊志书类型，道的史事则是道志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早在康熙初期诏修“一统志”时，大学士陈廷敬就已认识到道的书写问题，他与徐乾学专理志馆事务之际，曾就“一统志”中讨论各级政府体制及职官编写原则时曰：“今之督抚、藩臬、盐察、学政、驿传、粮储、提督、总镇，自当列于各布政司之后。一省而有两巡抚、两布按，虽分地而治，亦当与统辖全省者同例。虽驻扎别府（如江苏巡抚、布政驻苏州，湖南巡抚、布政驻长沙），而不得即系于所驻之府，重体统也。惟分巡守道及总镇辖一二府者，则随其所驻之地而系之。北直巡抚不系于顺天而系于保定，所以让尊也。他省初不得以为例，至北直督学亦当系于保定也。”^②这里陈廷敬明确提出“分巡守道”须“随其所驻之地而系之”的编写方法。

通过以上表格所列乾隆《重修肃州新志》、乾隆《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体例结构类目，从表面上看，志书首先以该道所属的州县卫所为纲，然后分门别类地叙述该区域的历史和现状，各纲（州县卫所）之间互不统属，可独立成书，看似与道无关。从书写实际来看，因道不是独立的行政区划，故志书修纂者在书写中巧妙地将道的建置与道员任职等史事包含在其驻地（州县）的叙事之中，笔者将这种独特的书写方式称为“以地存道”，详述如下：

1. 乾隆《重修肃州新志》对道的书写

乾隆《重修肃州新志》对道的书写情形，首先在“河西总叙”的“本朝建置”部分，按照自东向西的方位依次综述分守凉州道、分巡甘州道、分巡肃州道、安西兵备道的建置沿革。其记“肃州分巡道”曰：“肃州分巡道，领直隶州一县一……俱见后志内”；又记“安西兵备道”曰：“安西兵备道，领二厅四卫一所……俱见后志内”^③。这里，志书修纂者明确指出“俱见后志内”。

第一，将分巡肃州道的建置与道员任职等史事包含在其驻地——肃州直隶州的叙事之中，故在该志《肃州（直隶州）》分册的“公署”“职官”“军政”“马政”等类目中记述道的史事。在“公署”载“分巡肃州道署，在鼓楼西”^④。在“职官”中将道的建置与道员任职“前后题名具录”首列设置情形曰：“整饬肃州等处分巡道一员”，在“题名”中详载“本朝整饬肃州分巡道”任职情况，始于顺治六年（1647）任职的米国诏，止于乾隆二年任职的程世绥，（该志主修者黄文炜自雍正十二年至乾隆二年任职）。^⑤在“屯田”“军政”“马政”等类目中，亦将甘州、凉州的相关事务一并纳入，修纂者指出这些内容“本应见甘、凉之志”，“然统为肃州军需

① 乾隆《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五凉沿革考”，“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560号，第663页。

② 陈廷敬：《与徐少宗伯论一统志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53册《午亭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05页。

③ 乾隆《重修肃州新志》“河西总叙”，“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第48册，第137页。

④ 乾隆《重修肃州新志》“肃州·公署”，“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第48册，第176页。

⑤ 参见乾隆《重修肃州新志》“肃州·职官”，“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第48册，第201、205页。

起见……恐后世无从稽考，因亦附载于此”^①，可见，这样书写是基于当时道员供给军需的实际职掌考虑的。如果将分散在各类目中的叙述连缀在一起，即知悉分巡肃州道的设置始末、主要职掌、道署规制、道员任职，即“以地存道”，与其驻地史事相得益彰。

第二，将安西兵备道的建置与道员任职等史事包含在其驻地——安西卫的叙事之中，故在该志《安西卫》分册的“建置沿革”“公署仓库”“文武职官”“文诗”等类目中记述道的史事。在“建置沿革”中载“本朝经理关西，始建安西镇城”，“遂移旧安西文武驻扎本城，屹为重镇”^②。在“公署仓库”中载“兵备道衙门，本系安西同知署，雍正六年建，在鼓楼西，坐北向南。雍正十二年三月，改为道署，详见‘文’内”，故在“文诗”一目中收录“设立安西兵备道议”一文，详述安西兵备道设置始末。^③在“文武职官”中开首即曰“安西兵备道按察司副使一员，雍正十一年新设。吏书、人疫名数，工食俱与肃州道衙门同”，后述“安西兵备道”任职情况，始于雍正十一年任职的王全臣，止于雍正十三年任职的张元怀。^④如果将此分散在四类目中的叙述连缀在一起，即明晰安西兵备道的设置始末、主要职掌、道署规制、道员任职、属吏人数，即“以地存道”，与其驻地史事并行不悖。

2. 乾隆《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对道的书写

乾隆《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对道的书写情形，主要是将分守凉庄道的建置与道员任职等史事包含在其驻地——武威县的叙事之中，故在该志《智集·武威县志》的“地理志”“建置志”“官师志”“文艺志”中记述道的史事。在“建置志·公署”中载“分守凉庄道”曰：“道署：大门三楹，东官厅三楹，承差房五，西承差房五……”^⑤在“官师志·秩官·文秩官”中开首即曰：“凉庄道：明初设布政司僉事，寻罢，改按察分司，四十一道分巡始此。分守起于永乐间，遂定右参政、右参议。分守兵道之设，昉自洪熙，至弘治议增副僉一员。自是兵道盈天下。按：西宁道驻凉，明时已然。国初仍其制。至康熙二年，始改凉庄道。”^⑥后述“凉庄道”任职情况，始于康熙二年始改凉庄道的朱衣客，至于乾隆十年任职的张之浚，即该志主修者。在“地理志·赋则·俸工等项”中曰：“凉庄道，每岁俸薪银一百三十两，养廉银三千两，各项衙役工食银二百三十四两。”^⑦在“文艺志”中收录《凉庄道宪武廷适创建书院碑》，可知康熙四十一年担任凉庄道的武廷适开拓文教事业，创修书院事宜。^⑧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忠集·平番县志》的“官师志·名宦”中亦为担任凉庄道的高龙光、蒋洞等立传，述其治道善政。^⑨如果将以上分散在各类目中的叙述连缀在一起，即可知分守凉庄道的设置始末、主要职掌、道署规制、道员任职、属吏人数、道员薪俸、衙门开支、文教活动、著名道员等，即“以地存道”，与其驻地史事互为补充。

① 乾隆《重修肃州新志》“肃州·屯田”，“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第48册，第170页。

② 乾隆《重修肃州新志》“安西卫·建置沿革”，“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第48册，第336页。

③ 乾隆《重修肃州新志》“安西卫·公署仓库”，“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第48册，第341、349页。

④ 参见乾隆《重修肃州新志》“安西卫·文武职官”，“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第48册，第342页。

⑤ 乾隆《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第1卷《智集·武威县志》“建置志·公署”，“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560号，第54页。

⑥ 乾隆《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第1卷《智集·武威县志》“官师志·秩官·文秩官”，“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560号，第71—74页。

⑦ 乾隆《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第1卷《智集·武威县志》“地理志·赋则”，第36页。

⑧ 参见乾隆《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第1卷《智集·武威县志》“文艺志·碑记”，第185—186页。

⑨ 参见乾隆《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第5卷《忠集·平番县志》“官师志·名宦”，第611—612页。

通过以上乾隆《重修肃州新志》与乾隆《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中采用“以地存道”的方式书写道的史事，既是道制的特殊性决定的，也是修纂者“折中”的“志识”体现。^①

结 语

清代甘肃河西走廊地区道志修纂的缘起，主要是在清王朝经营西北边疆的战略直接影响，道员从“探考治道”的施政视域出发，以守土有责的态度而自觉辑修的地方行为。从乾隆《重修肃州新志》、乾隆《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来看，两种道志形成了“两道合志”与“一道一志”两种不同的编纂模式，这是由道的辖区与道员职掌所决定的。从表面上看，道志首先以该道所属的州县卫所为纲，然后分门别类地叙述该区域的历史和现状，各纲（州县卫所）之间互不统属，看似与道无关。从书写实际来看，因道不是独立的行政区划，故修纂者在书写中巧妙地将道的建置与道员任职等史事包含在其驻地（州县）的叙事之中，如将分散在各类目中的叙述连缀在一起，即可获悉道的建置沿革、道员职掌与任职、道署规制与开支、衙门属吏与数量、道员薪俸与文教活动、著名道员事迹等，可称作“以地存道”的书写方式，既是道制的特殊性决定的，也是修纂者“折中”的“志识”体现，此亦“有别于其他著述的独特标志”。这种编纂体例上的特殊性则是由道属非正式行政区划的性质决定的，在书写模式采用“以地存道”的方式，保证了各政区叙事的完整性，从某种意义上亦可视作州县卫所的合志。

（作者单位：淮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本文责编：周 全 宿万涛

《宋代方志考证与研究》出版

2021年12月，桂始馨博士的《宋代方志考证与研究》一书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增补而成，包括方志总目篇、方志研究篇两大部分。方志总目篇对宋代方志进行整理与考订，共整理考订出志书1072种，其中总志34种，各地方志1038种。收录书名、存佚与否、修纂者（事迹可考者皆列小传）、公私目录主要著录情况及佚文等。总目篇以现行行政区划分省、市收录，便于今人使用。方志研究篇在概述宋以前方志发展情况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两宋方志转型过程、路径、动因，并分析南宋方志理论。作者认为，图经、地记吸纳官员、进士题名与地方诗文集等人文内容后，于南宋定型为方志；同时，南宋方志学家讨论了方志起源、性质、功能之本体论与修纂人选、体裁、体例、编纂原则、编纂方法等编纂学，宣告方志理论的形成。由此可确定方志学已成立于南宋，从而纠正了学界长期以来承袭自梁启超“‘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的认识。

该著资料丰富，考证细致，论述深入，观点科学，是方志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于今天各地编纂方志亦具有现实参考价值。

^① 章学诚在《湖北通志·序传》中提出“志识”说，其曰：“夫志者，识也，典雅可识，所以期久远也”，强调方志编纂者的“心裁”与“见识”。参见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026页。